

【拒绝流行】值得拿命去换新闻吗？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台风“利奇马”来了，把中国记者吹上了热搜。风中凌乱的各种姿态，火了。人们躲着台风，记者却逆向而行，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记者，在危险的第一现场给公众带来报道，这种职业精神让人佩服。但我还是想对同行说一句，台风没有新闻，只有残酷，只有及时的信息发布。这是超强台风，是大灾难，没什么值得让记者拿身体、拿命去换的新闻。

跟一个媒体同行讨论这个话题，作为后方的编辑，她负责调度前方的台风报道，给记者派任务，她非常犹豫地说：要求台风地区记者发稿，还是觉得很残忍。——我没有觉得这种“犹豫”是一种懦弱，也没觉得这种“对第一现场的恐惧”有什么不专业，这恰恰是对生命的负责。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家媒体的年轻记者请命去灾区采访，总编辑

【含英咀华】过度西化：破裤子及其他



黄维傑 香港学者、作家

牛仔裤紧绷捆来，穿起来并不舒适，且据说对身体有害无益。很多女性崇洋，学牛仔，且翻新花样：把簇新完好的牛仔裤剪破几个洞，自家地加入新潮丐帮。双腿趋新，身体其他部位不能守旧；于是拖地裙一穿，阔边帽一戴，让人巴黎起来、纽约起来。室内奥热而拥挤，西化的小姐们却只管不时时髦。从断臂的维纳斯到罗裙因风而扬起的玛丽莲·梦露，西方定义了丰乳为美，一些东方女性于是人工丰乳。7月有报道，一个爱美的少妇，在隆胸的手术台上“香消玉殒”了。这是俗话说的“只要靓，不要命”。

时装和美容的这些西化，我谓之过度西化。学术文化界一样有过度西化。近代西方的科技突飞猛进，科学理论艰深，技术工梦露，不像人文学科的希腊史诗、罗马诗论、莎

翁戏剧，虽经历百载千年，都易读好懂（当然诠释研究的专家仍然代有其人），人文界的自卑感来了，跟着是自大感。我们人文这一行也不容易啊，于是艰难复杂的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都赶时髦纷纷登场。西方的艰难复杂之风劲吹，东方人望风归顺。“德里达文古怪，从来不用古典学院的简明清晰的语言写作”，因此解读维艰，但神州学者对他崇而敬之。一位博士生导师公开诉苦说：“我搞散文研究搞了数十年，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理论来研究。我请研究生告诉我，该看哪些西方理论；而这些理论，我都看不懂。研究生写的论文，我也看不懂。”

如此等等，是过度西化，是恶性西化。8月下旬澳门大学举办汉学国际研讨会，主题之一是中国新文化百年史的讨论。我准备对过度西化现象加以针砭。

【别处生活】情境与服务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情境指可用于表征实体情况的任何信息。实体是被认为同用户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交互相关的人、地点或对象，包括用户和应用程序本身。戴(A. K. Dey)和阿波德(G.D. Abowd)把情境分为四类：位置、身份、活动和时间。位置指的是你在哪里(where)。身份指的是你是谁(who)。活动表明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what)。同时，为了确定一个情境的特征，还必须加上时间维度(when)。

这些情境类型不仅回答了关于谁、什么、何时、何地的问题，也指向其他来源的情境信息。例如，给出一个人的身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相关信息，比如电话号码、地址、电子邮件、生日、朋友名单、与环境中其他人的关系等等。找出一个实体的位置，我们可以确定实体附近的其他对象或人物，以及实体附近发生的活动。从这些示例中

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实体的主要情境信息可以用作索引，便于我们查找同一实体的辅助情境信息(例如，从一个人的身份溯及其电子邮件地址)和其他相关实体的主要情境信息(例如，发现同一位置的其他人)。

史无前例的海量情境信息，记录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决定以及我们的生活本身。举个例子，一位用户经常去什么地方活动，在感知情境的计算当中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可以从推断出许多意义。我们光顾之地反映着我们的品位与生活方式，并且形塑着我们的社会关系。通过计算，给用户常去的场所赋予某种语义，每一场所都会被一段时间以来用户的活动历史所再现，再加上用户的智能手机所感知的其他情境信息，有可能催生许多新的服务需求。在此处，不同的输入信息产生不同的价值；例如，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未见得高过光顾次数。设想一下，不可见根据光顾次数而构造某种定制化的媒体或者广告？

【生活速写】母亲



蓝博洲 台湾作家

母亲走了。日本占据台湾的1923年，母亲出生于今苗栗县公馆乡馆南村佃农家庭，刚刚学会走路没几年的六、七岁，就在农忙时期下田劳动。到了入学年纪，聪明的她很想念书，却因为做事利落，是个好帮手，没能上学。她就在家帮忙干农活，做家务，一直到年过二十，经由媒妁，嫁给苗栗街人岑老实的父亲。

日本当局“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利用台湾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掠夺土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得广大的台湾农民陷于极端困苦的状态。祖父就因为缴不起租谷被地主“吊佃”而沦为贫苦工人。

母亲的娘家并不富有，但自己耕田种菜，总是有得吃。可她没想到，夫家弟妹众多，生活竟然远比娘家要辛苦得多。尽管如此，她还是毫无怨言，操持理家，并且跟随做泥水工的父亲出外打工，补贴家用。大家庭难免纠葛。作为长媳的她顾全大局，一切以维持和睦为首要考虑，宁可吃亏，尽可能避免没有必要的妯娌或婆媳纠纷。

分家之后，母亲依然经常做父亲的帮手出外打工，同时还要操持家务，把九个小孩一带大。只是食指繁多，兄姊们虽然都像母亲一样聪明，学习成绩也都优秀，却因为经济困难而未能受到较高的教育；尤其是三个姐姐，国小或初中毕业就得做女工，帮忙分担家计。对未能上学的母亲来说，这也是内心的遗憾。

母亲的儿女谈不上功成名就，但都深受她的教诲，朴实正直，不为恶，不欺人，是邻里眼中的积善之家。也因此，老天保佑，晚年的母亲历经几次病魔侵袭，最后都坚强地活了下来。一直到七月下旬，即将迈入百岁高寿之时不遇就医，终因器官老化，而于八月四日清晨诀别尘世。

母亲一生劳苦，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但实实在在过了一生。今天，她虽然离开了人间，却给予孙留下一颗行善做人的种子。

【昙花的话】桃子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桃子上市的时候，我在广州。满街满市都是鹰嘴蜜桃，染着红晕的桃子，好似恋爱中的少女，甜甜的蜜意源源沁出。我和朋友阿晶逛街，一看便着迷，买了两斤，拎在手上，好似拎了一袋沉甸甸的欢喜。

可是，走不一会儿，我便后悔了，因为接下来，我在其他摊子看到的桃子，更为丰满、更为新鲜，也更为诱人。我对阿晶说：“以前母亲常对我说，一定要货比三家才决定，我实在是太心急了吧！”阿晶笑了起来，说：“这些摊贩的货源都是一样的，你嫌弃弄手中的，只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它们。”

啊，风轻云淡的几句话，烙出了我满颊的滚烫。经已拥有，便不珍惜。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贫瘠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往往不自觉地体现在亲情上。

未婚的，对自家人粗声粗气，对陌生人却温言细语；对门内人颐指气使，对门外人却温文尔雅；对父母周全的照顾视而不见，对朋友的略施小惠感激涕零。以为父母是蜡塑木雕的，没有知觉、没有感受，刀砍箭射都不会受伤。然而，受伤也好、流血也罢，父母永远都在那里，等着。等着你的呼唤、等着你的需要。有一天，当鞠躬尽瘁的父母化为两缕青烟时，你才蓦然惊觉，天天把你的心房照得熠熠生辉的，原来是家里这两颗硕大的珍珠。这时，在一片漆黑的凄凉里，后悔如刀，一下一下地刮着你的心，你痛，却无药可医。

已婚的，家有无微不至的贤妻，却日日高唱“烟花哪比野花香”——以为逢场作戏是无伤大雅的消遣、以为夜夜笙歌而家里亮着一盏灯是理所当然的事、以一纸婚书便是一条终生不会断裂的铁链铜索。他忘记了，柔软的心是长着翅膀的。当有一天伤势太重而痛楚难忍时，翅膀会张得开开的，飞得远远的，踪影难觅。这时，后悔莫及的他，痛哭流涕，说：“我错了，我错了！”可是，枕边人却置若罔闻了。

拥有时，便该感恩。唯有惜福，每一天的日子才会甜美如桃。

【横眉热对】写在胜利纪念日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每年8月15日都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一天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胜利有各种不同的纪念，对于我来说，这纪念和母亲的记忆有直接关系。

我小时候总听母亲讲述她年轻时遭遇抗战的情形，她说，日本人一路进犯，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婆，一个小脚旧式妇人，在我的外公，也就是母亲的父亲去世之后的日子里，如何带着一家子逃难，从湖北武汉往南，经过湖南再往西，最后逃到了广西境内，住在美丽的桂林。母亲说，她是家里老大，中学刚毕业，没钱上大学，为了养家糊口，必须出外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学里教书，收入仅勉强度日而已。最可怕的是随时躲避日本人的突然进犯。母亲说，有一次，日本人来了，一家随着难民的队伍躲进了山里。大家盯着远处的日本人，声都不敢吭一下。母亲最小的弟弟那个时候刚刚满月，随时可能会哭泣，如果真的哭了起来，就暴露了目标。所以当时大家总盯着她的小弟，万一哭起来，为了众人的安全，只能马上扼死。母亲每次都会认真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候，小弟总是睡了过去，没有一次哭泣。我听了颇为惊讶，母亲的小弟就是我的小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在广州读初中和高中，很是亲热。我小时对小舅的印象是，他很能读书，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广雅中学，接着居然考上了北京外交学院法语系，正式进入外交系统。改革开放后还到法国去学专利，成为中国第一批专利法专家，参与了国家专利局的初建，最后以司长身份退休。我常想，如果当年我小舅突然哭了起来，后来的故事岂不没了？

当然这是苦难的事。另一件事就是著名的桂林米粉，母亲说，这桂林米粉的确好吃。我问，和广州的沙河粉比起来如何？母亲说，那没法比，还是桂林米粉好吃。因为没有去过桂林，只能通过广州的桂林米粉理解一下其中的美味。及至很多年后，终于有了一趟桂林之行，在朋友的热情带领下，亲口尝到了地道的桂林米粉，才发现，桂林米粉原来不是汤粉，而是用酱汁调味的。朋友说，桂林米粉的美妙，除了米粉的制作独特以外，最重要的就这个酱汁。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立此存照

孙颀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在担任出版社、出版局、作协负责人之前，他首先是一位作家，以描述知识分子的小篇小说见长。

他的最新长篇《风眼》，中心事件是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定论，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出版一套《市场经济常识丛书》，遭上级领导严厉批评，从社长、几位副总直到责任编辑，历经着惊涛骇浪般的挣扎，如何紧急回收书款？隐秘的消息被谁走漏？到底谁是背叛者？小说在一种内在紧张之后，写出了对一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情感和命运的拷问。

我的第一个印象关于标题。“风眼”这标题如同一个关键词，含义丰富，可供发散出去的意蕴非常丰饶。风暴袭来时，风眼格外宁静的瞬间，所有的力量涌动聚集，它去往哪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都只能预料。正是在这样众声喧哗的时候，个人的选择和担当，尤其重要。就如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风雨欲来，反应迅速的人退缩自保，有的人各种表态和行为，以前，我和王安忆就她的长篇《启蒙时代》做过一个访谈，当时她说了一句：好的标题，是抵达彼岸的一半。《风眼》就是这样一个标题。

第二个印象：小说的气质。小说的气质其实是由作家的气质构成的。孙颀一向以知识分子题材著称，但却一直没有触碰他最熟悉的“出版”，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我等得很久了，在脑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与人物的瓜熟蒂落。”这部小说有浓浓的书卷气，这不仅因为孙颀描述的是被称为“杂家”的编辑，还因为这本书有一种阅尽热闹之后的安静，那种安静其实是一种坚定的存在的力量。

第三个印象：立此存照。改革开放四十年，一路走来，说是大家记忆犹深，但其实很多人，很多历程，也会慢慢地淡忘。《风眼》为经济体制改革之初那个时期的出版业，做了一个高度浓缩的“立此存照”。

香港作家系列2

访谈

黄碧云：写作是生活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李旭光 王宏

只写自己喜爱的东西

□写作在您生活中的地位是什么，会因此而放弃其他吗？
黄碧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了。写作还是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遇到了会深思熟虑，但是不会轻易放弃文学创作。

□作品一旦形成风格后，是否很难再去打破？
黄碧云：现在已经是没有寻找，没有选择，只写自己喜爱的东西，不会固定模式。

作品要与眼前的东西保持距离

□您认为作家与作品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黄碧云：我认为现实是比较重要的，我作为一个社会里的人，会关注。同时，作品需要不断总结，要与眼前的东西保持距离，比如自己的感情和理智等。

□您认为未来将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黄碧云：差不多吧，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我不大会预测将来的变化，但我可以从过去的经历去了解，从我自身的成长环境中发现，其实仅有物质条件的进步是明显的，但人的存在状态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他也不好说。对此，我也会不安，会很难过。

名作家講座 黃碧雲 小說語言的隱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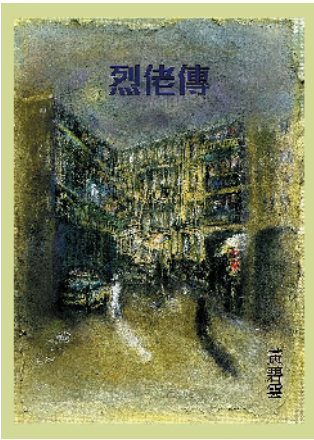
黄碧云的《盛世恋》是我对她的初印象，从这部与张爱玲《倾城之恋》十分相似的小说可以看出黄碧云欲挣脱女性写作的束缚，不局限在女性与爱情的题材中，看似写爱情故事实则反思大时代中人们的精神失落。黄碧云的很多作品都在历史、社会、哲学、人性等层面上给予读者深刻的思考，比如《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体现出港人在特殊时期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他们的漂泊感以及希望寻找精神皈依；《末日酒店》像另一版本的《茶馆》，通过不断变换的酒店管理者反映回归前的澳门日渐衰落的过程；《烈佬传》《烈女图》着眼香港本土历史，关照脆弱，发现小人物的个性闪光点；新作《卢麒之死》打破小说的“虚构”，尝试以历史写小说。

因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黄碧云拥有大格局和大视野，她在文字中散发的气场足以证明她并非一个弱女子，而是一位经过岁月沉淀积累智慧和力量的女性。黄碧云的作品善于探寻问题的本质，但不会把答案浅露于作品中，她刻意创造的距离与空白给予读者思考的空间。可以说，黄碧云复杂的童年，前卫且丰盛的灵魂，叛逆又直率的性格，多重身份与异域经历等等造就了她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这让她关注到许多香港作家

黄碧云：立足香港本土叙事

□朱绮丽

黄碧云，女，1961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曾获得香港大学专业进修法律专业文凭，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修读法文及法国文化课程。2014年凭借《烈佬传》获得香港第五届“红楼梦奖”首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香港作家。



不会注意的历史与人物，并且不断反思。

在创作题材方面，黄碧云一直敢于突破，在自身面对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从出走回归的过程，这表现在她前期作品多写异域故事，从书写异乡漂泊行旅到后期回归香港本土历史故事。她意识到逃离并不能寻找到真正的归属感，于是转而立足香港本土叙事。随着年龄的增長，思想和文风都没有那么激烈，又经过自我反思后认同自己客家人的身份，并且“不自觉地寻根”。黄碧云对于认同问题的思考与创作能够帮助更多人设身处地了解香港，也为港人如何自处提供方向。

此外，黄碧云的“女性书写”也是她另一个较为成功的写作方向。她通过观察女性处境，从历史脉络中感受女性力量，创作出《烈女图》；穿越性别边界，即超越女性的性别而去写男性，创作出《烈佬传》。这两者不仅仅是性别的对立，更是她意图重塑女性语言的尝试。

黄碧云的语言是诗意、艺术的，正如她自己所说“以小说来写诗”，她的文字表达精准但也抽象，因为诗化的，既抽象又跳跃。她前期的作品语言相对潦浅，也许没有多少香港作家能够写出比她更加暴烈的语言，这对于一位女性作家而言

或许是她能够获得关注的原因之一。而中后期的文字则愈发收敛、平和、克制，不再那么激烈，也许是心境或是年龄的缘故，让她远离热情，阅历的积攒让她想通许多问题，断地自我反思也让她行文更加客观理性。这时候她的语言就像是有了年份的钟鼓，沉稳地，一下又一下地冲击读者的思绪。

黄碧云很早就开始追求小说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主要体现在小说素材源于现实生活。她曾经说过，“用作品来整理自己的人生”。《微喜重行》中陈若拙就是以她哥哥为原型，这部小说被她称为写给去世哥哥的“遗书”，只是这封“遗书”他无法听见。对比其他作家对小说的虚构，黄碧云许多作品以现实为依托，在史料、新闻、口述历史等基础上进行创作。从早期《失城》中的陈路远（从新闻中取得素材），到后来的《烈女图》（根据《阿婆口述历史》），再到她2018年的新作《卢麒之死》，更是开启了非虚构写作的尝试，即根据历史资料写小说，对事件进行重新组合编排。

黄碧云小说中的真实感其实来源于生活、历史与她自身经历，这种真实感的分寸很难把握，但她率先作出尝试。非虚构文学近几十年才开始从国外传入，她这部作品算是华语文学中非虚构文学的先锋。

在虚构与历史之间游离

□黄玮

从表达形式看，黄碧云的叙事经历了从虚构故事到非虚构写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叙述逐渐减少了主观想象，而力图真实反映历史真实。

从文本虚构到展现历史

在黄碧云创作的中后期，她一直致力于通过口述历史、采访、历史资料意图真实地反映历史，逐渐走向非虚构。这一转变从《烈女图》《烈佬传》开始，她在一个访谈中谈到曾想写一个香港监狱史的故事，当时她以为历史事件进入小说就是历史感，就是时代记忆。黄碧云的写作愿望已经从虚构转变为真实地展现历史，她写作策略和表达形式的改变也对文本叙事有很大影响。

与前期的虚构文本不同的是，非虚构文本的叙述人与作家的距离发生变化，黄碧云的非虚构作品中叙述人与作者的距离变大，叙述人是生活世界的真实人物，不是作者虚构的人物，这时候叙述人与作者主观意识的重合面变少，属于“不可靠叙述者”，基本不能反映作者的想法，因此探索黄碧云文学想象的难度就更大。非虚构文本中的人物不存在“塑造”问题，因为这是真实人物，比如文本中的主角卢麒、苏守忠等都是真实的人物，事件也是真实的，作者只能如实反映。尤其是黄碧云的非虚构文本取材、写作方式限制了作者的自我表达，如《卢麒之死》是黄碧云通过收集史料创作的，里面的人物、语言都是从各种报刊、史料中摘录下来，作者根本没有机会塑造人物和干预叙述者。《卢麒之死》中很大程度上具有客观、纪实性，作者的个人观点隐藏在大量客观叙述中，非常隐晦、抽象又难以切割。

将主观表达夹杂在史料中

黄碧云写作从虚构到非虚构的另一个变化是主观想象变少，历史事件占主导。除了上述提到的人物是现实存在以外，事件本身也是真实的。非虚构文本的真实性大于虚构文本，而作者的主观想象部分比虚构文本少。正如冯骥才先生在《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中提到关于非虚构的特点：“它受制于生活的事实，它不能天马行空地自由想象，不能对生活改变与随意添加，必须遵守‘诚实写作’的原则。”但与此同时，既然非虚构小说，也要有小说中的“虚构属性”，这就体现在黄碧云那些夹杂在史料中的主观表达中。

除了整合有关史料以外，黄碧云偶尔表达只言片语，穿插一些感性的语言，这与理智、冷静、历史感话语不同，甚至看似与整个情节毫不相关，但正是这种语言的存



在，才让文本成为小说。比如她对混乱的失望用诗句表达：“如我们看不见所有的路，起吗，还有，然而，有你有我，有通近，有距离，有我一闪的柔弱，你的长冷长空。”值得注意的是，黄碧云把这部分体现自己观点的内容用括号括起来或是写成诗歌的形式，而史料则全部用引号，这让读者能够十分清楚地区分作者的观点与史料。然而，黄碧云刻意让自己的观点显得十分零碎，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阅读障碍，作者的观点对读者理解事件本身基本没有影响。

进入“破”与“立”的新阶段

总体而言，非虚构写作让黄碧云的叙事比起她以前的文本更接近历史，少了许多主观想象与文学虚饰，这让她把自己的感受剥离出来，从而理智地叙述真实事件，就如冯骥才所说的，“用生活写生活”。非虚构的作用就是小说与生活世界同构下带来的真实感，这是虚构文学无法做到的，这可以增加真实性和可信度，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它来自真实的生活，是原本本本生活的真实，所以它是生活、历史和命运毋庸置疑的见证。”

非虚构写作实际上是黄碧云重新演绎历史的方式，体现了她追求“真实”的写作观念，也是她写作上迈入一个新阶段的“破”与“立”。她的非虚构小说在历史之中，也在历史之外，不断在虚构与历史之间游荡。

《卢麒之死》是黄碧云在思考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之后创作出来的小说，把历史的理性融入小说中，从而让小说有历史感。这也是她把历史引入小说，以非虚构写虚构的尝试，这在华人作家中是创新且前卫的。但同时，小说中大量历史资料的整合也会让小说的艺术性减弱，过分追求“真实”有可能削弱虚构所带来的戏剧感，甚至违背“小说”虚构的属性。